

物语
一把旧藤椅

徐建平

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有机会常去陪安踏集团创始人、和敏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丁和木先生练习书法。因丁老先生今年九十岁,每写完一幅字,就会固定坐到书桌旁边的一张旧藤椅上,让工作人员把他刚写完的字放在地板上,一边欣赏,一边点评。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那把藤椅的特别。那天,我不经意间注意到他坐的那把旧藤椅,从外观上看,已经有相当的年份了,把手、椅脚等几个地方竟然还用透明胶带粘着。我以为这把旧藤椅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问丁老先生,没想到,丁老先生带着他标志性的微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呀,我这人对吃、穿、用没什么讲究。虽然这把椅子三十多年了,还能用就用,不要浪费。”旁边的工作人员补充道:“董事长连用面巾纸都是能省则省,一张面巾纸,都要撕一半用,另一半放在口袋里,下次用……”我一注意,果然如此。

那一刻,我很是惊讶:丁老先生的安踏集团及和敏基金会这两个公益平台的慈善公益总捐赠已超过了 30 亿元,仅在我所任职的晋江第五实验小学,捐赠就超过 1500 多万元。今年的第 41 个教师节期间,又慷慨捐资 350 万元,助力添置三个校区教室和教师宿舍的空调,让学校师生、家长多年的心愿成真。在慈善大手笔捐赠的另一面,旧藤椅扶手上的凹痕记录着他关于“大方与节约”哲学不一样的解读。

在旧藤椅的边上,是印有安踏集团收购的海外品牌矩阵中一个著名商标的户外折叠帆布椅,奶白色,给工作人员或客人坐。一旧一新,一黄一白;一个是传统的代表,一个是现代化的隐喻;一个像淡然静默的智慧长者,一个像乐观进取的年轻人。两张椅子,毫无违和感并排在一起,给人以无限的沉思。

更想起了丁老先生时常聊起的“良心锤”文化。1982 年,丁和木出资与乡亲共同组建了岸兜第一皮塑厂,1988 年,成立求质皮鞋厂,他担任厂长,提出了“良心锤”文化,每双鞋最后一道工序是用锤子将鞋面和鞋底锤扎实,这样才不容易脱胶。经过反复验证,每双鞋至少要锤 30 下,才能达到结实的效果,丁老先生就将“锤 30 下”作为一项质量管理的硬性规定,要求员工们落实,“做生意就是做良心的事,有好的品质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穿得更久,长远看,消费者更省钱。”如今,尽管制鞋工艺已经不需要人工锤打,但“良心锤”文化作为企业对于消费者的责任和承诺,一直在安踏集团传承了下来。我突然觉得,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节俭的智慧呢?——把资源用在最该用的地方,不浪费每一分价值。

残缺,有时就是最完整的注脚。当我注视那些被岁月打磨出玉质感的藤节时,忽然懂得节约的最高形态,是允许物品拥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就像敦煌的飞天褪去了金箔后,显露出泥胎的本真,才给人最深的震撼。这张旧藤椅完成了对使用价值的超越——它从普通的家具演绎成为光阴的拓片,在无声地昭示:省下的不是钱,而是心;珍惜的不是物,而是道。



乡情
故乡的“夫妻井”

刘鹰潭

我老家在晋江东石塔头刘村。故乡厚重的历史沉淀、深厚的革命传统闻名遐迩,尽在我的心灵深处魂牵梦萦。

堂叔是香港一名记者,经常报道乡间乡讯。去年春节,趁堂叔回乡过节,我和老爸约上他重游故乡。革命斗争史馆、慈元皇太后行宫、虎啸塔、乡村记忆馆、福华图书馆……一系列景点,历久弥新。而此次最大的收获,是有趣的网红打卡地——“夫妻井”。

“夫妻井”地属村里“后角区”,也称“后角井”。其历史悠久,水质清纯甘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特别是我们这偏僻的小渔村,生活淡水贵如油,来之不易,弥足珍贵。逢年过节,村民们都喜欢挑这口井的井水回家磨豆腐,做出来的豆腐甘润爽口。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夫妻井”供水的功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而今作为故乡家风家训的教育基地,却重新焕发其新的意义,正如闽南四句所言:

夫妻井水甜又甜,
逢早担担起五更。
昨日新婚燕尔时,
互助互爱福无边。

这首小诗写的是“夫妻井”名称的由来,以前每逢村里有人结婚,婚礼翌日天蒙蒙亮,必定安排新郎新娘,互换服装,扛一根竹竿,来此地打水。沿途打闹的伙伴,羞涩的新人,是一番何等热闹的景象!这个仪式寓教于乐,启迪新婚夫妻要饮水思源,同甘共苦,不忘父母养育之恩,蕴含故乡的家风家训——“忠孝传家”的文化精髓。

触景生情,老爸和堂叔相视而笑,不禁忆起堂叔当年结婚的情景:

我差不多读小学的年代,那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但充满乐趣。年轻的堂叔个性十足,老大不小,抱定独身主义。我奶奶属族里最大辈分,通过权威媒人的介绍,好事多磨,堂叔堂婶终成眷属。婚礼前一天,堂叔家即进入喜庆状态,开始自制糕点,开办“食堂”,族里亲朋,大人酒足饭饱,小年轻则到处张罗租借板凳桌面。村民家里是有自备八仙桌的,用红漆写上名字。故乡淳朴的风气,哪家举办宴席,就派人到处收集八仙桌,那个场面看上去像“联合国的装备”。不一样的桌椅,却一样的场面温馨。而筵席散去,又一起闹哄哄地归还,伴手儿的几颗油炸粿,就是“租借”的费用。

“背井离乡”是一个浸透中国人复杂情感的词语,短短四字却饱含无尽的沧桑和辛酸。我们今天和平、繁荣的生活,是革命先烈、建设者、劳动者等无数“挖井人”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忘挖井人”就是告诫我们,历史绝不能遗忘,先辈的功绩必须铭记。

故乡的“夫妻井”提醒每一个享受甘泉的人,常怀感恩之心,铭记来时之路,并努力成为后人的“挖井人”。



味道
凝聚海魂的蚵仔煎

乔志兵

泉州巷弄的初夜,总有一缕香气在等我。那香气裹挟着海风,携着烟火气,在转角处与我相遇。

初见蚵仔煎时,是我和同事去各市场调研,正巧路过后坂小区菜市场,同事热情地招待我,吃蚵仔煎,还说她外婆是菲律宾归侨,之前总挑着担,走街串巷卖蚵仔煎。反正她这一带熟,见人就热情地招呼,小吃店老板喊她小名,擦擦擦桌子,叫我们坐下。

也正是这时,我看老板怎么做蚵仔煎。蚵如珍珠散落,裹着透亮的番薯粉,蛋液倾泻而下,瞬间凝成金黄的外衣。葱花点缀其间,似海面上漂浮的星子。老板用铲子翻动,香气便挣脱束缚,蹿入鼻腔。我屏息,好似即将离港的渔船,等待一场与大海的私语。

抒怀
冠军启示录

赖芯渝

五月的多哈,在沙与海的呢喃中,两位年轻的身影用球拍书写着属于中国乒乓的新传奇:王楚钦、孙颖莎两个人的名字将随着刻刀卷起的飞屑,第三次被刻在兹·赫杜塞克杯的底座上。一切尘埃落定,孙颖莎第二次躺倒在世乒赛的赛场上,卫冕冠军再一次捧起吉·盖斯特杯;当舞台上奏响为冠军而鸣的旋律,圣·勃莱德杯迎来了他的新主人,王楚钦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首位左手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这趟旅程的意义已然超越了胜利本身:这是为国争光的信念,是对坚持的礼赞,是蜕变的回响,更是中国乒乓新生代最完美的宣言。

为国争光的信念,是支撑他们穿越风雨的精神罗盘。耀眼的光芒射向多哈世乒赛混双冠军领奖台上,一抹快意又淡然的笑容出现在两个人的脸上。在东京奥运失利后的日子里,这对年轻的组合将“为国争光”的信念化作训练馆里日复一日的汗水。孙颖莎曾说:“胸前的国旗永远大于身后的姓名。”王楚钦在巴黎夺冠后也表示:“我想用生命去换回这块金牌。”

回望来路,在 2017 年韩国牙山破土而出的萌芽是穿过了雅加达的青春风暴,经历了休斯敦、德班成长浇灌,接连在杭州和巴黎结出了硕果。如今在卡塔尔的多哈实现了世

第一口,是惊艳。外酥的脆壳在齿间碎裂,内里却柔软如云,海蛎的鲜甜裹着蛋香,在舌尖绽放。那滋味像潮水漫过礁石,带着咸湿与清甜,又似海风吹过脸颊,留下绵长的回味。我站在摊前,捧着热腾腾的铁盘,竟忘了菜市场的喧嚣,只觉自己与这方寸间的美味,早已相识千年。

后来听同事说,这蚵仔煎里藏着渔民的故事。昔年他们以海为生,将捕获的海蛎与番薯粉相融,煎成充饥的饼。生活的艰辛,在油与火的淬炼中,竟化作一道慰藉灵魂的风味,或许还添了几分思乡的滋味。蚵仔煎,原是泉州人与海共生、与岁月相搏的见证。

如今,它成了泉州街头的常客。

夜市灯火下,总见人们围着小摊,等待那一铲铲的鲜香。有人执着于老店的古早味,有人偏爱新派的创新搭配。但无论怎样,那份对海蛎的钟情,对烟火气的眷恋,始终未变。蚵仔煎,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是泉州人舌尖上的乡愁,也是旅人记忆里的美食篇。

我曾想过,为何独独与蚵仔煎结缘?或许是因为它身上凝聚了海的魂魄,那海蛎生于潮间,汲取了浪的精华;番薯粉扎根土地,沉淀着闽南的质朴;而油煎的热烈,又恰似泉州人热情的性格。一口蚵仔煎,便是尝尽了一方水土的性情。

后来,我特意又去寻那摊蚵仔煎。香气依旧,老板的笑容依旧。这一次,我吃得格外慢,想将这份缘分细细咀嚼,存入记忆的匣子。

临别,老板递来打包好的蚵仔煎,笑道:“带路上吃,别凉了味。”我点头,忽然觉得,蚵仔煎的缘分,原是海风与舌尖的约定。它告诉我,有些味道,一旦相遇,便是一生的挂念。

天,体育馆的大屏幕将那颗戏剧性的回球从各个角度不断回放,在孙颖莎睁大的眼睛里折射出奇异的闪光。经过激烈回合后,孙颖莎被汗水浸湿的球衣贴在胸口起伏伏,她没有摇头,也不抱怨,更不沮丧,挂在脸上的是一抹带有感慨意味的笑容。

回望这段淬炼之路,这个独一无二的少女在自我塑造中完成了蜕变——从初琢的璞玉到出鞘的利刃,她在胜负的刀锋上起舞,于跌宕起伏间寻觅那道制胜的窄门。在 2025 年初夏,在一方栗色的球桌上,她捏捏鼻头,甩掉汗水,一拍又一拍,咬住比分,扛住对手,直到最后一场胜利终结。她向所有投射来的目光宣告:低谷已然过去,诺言不会落空,征途正行向顶峰,而我已然实现蜕变。

回望王楚钦、孙颖莎的成长之路,他们的价值不仅在于奖牌,更在于展现了一种健全的奋斗者心态:既全力以赴追求卓越,又能超然看待得失;既坚持个人特点,又珍视团队价值;既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更在精神上不断成长。

作为汉语言文学师范生,我们同样可以在三尺讲台上诠释这种精神——认真备好每堂课是对专业的尊重,平等关爱每个学生是对初心的坚守,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传递人文精神则是教育者的担当。

王楚钦、孙颖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不是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在奋斗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教育的真谛不在于灌输多少知识,而在于点燃学生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愿我们都能如他们一般,在各自的领域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姿态,以奋斗描绘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世相
捡回来的花盆

梁子

阳台上那些拾捡回来的花盆,终于被我清理掉了。那些花盆是我把朋友不要的旧花盆和小区楼下别人丢弃的花盆,不管合不合适统统都搬回家的,挤在小小的阳台上。小阳台被挤得只剩下一条缝隙可过,杂乱无章。想象一下,一米来宽的阳台上不仅排满十几盆花,过道上还有七八个空花盆和一桶桶用不上的土,杂七杂八乱成一堆。它的杂乱和家的简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拾别人不要的花盆,原是为环保二次利用,没承想是欲望在堆砌杂乱!

那天,我不顾早上上三节瑜伽课的疲惫,利用午间短短的一小时,顶着秋阳,骑着电动车,用不娴熟的车技驮着一个一米来高的大花盆,那是朋友不要的。我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只知道,驮回家。跑了两三趟,驮回四五个花盆,拿土、买花及栽种,工作之余的我,体能已有些透支,再加上如此折腾,可不是一般的累人。那些天,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关注起朋友家门口那些空置的花盆,时不时的就想象着骑电动车寻找被别人丢弃的花盆,好像我家有一个让我“填”不满的大阳台。

我把欲望堆砌着,用一地鸡毛的方式,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形式,从盲目举止到物质,从一碗一碟一桌一椅开始,到最后“托盘”式的贪婪,好像无穷尽。学习了心理学后才了解它累人的原因,才知它是潜意识里匮乏的表现,常让人患得患失,琐碎而折磨人。它没格局,它事无巨细,一件接着一件自然流露,却匮乏如沙漠。

花盆见证了我的愚昧、幼稚,却陪我度过了时光的虚无。只因为我心智不成熟,不懂得、不知贫乏是种情绪病,每每索取,只是躯体反应的短暂释放。第二天脑子就会冒出另一个东西,再索取,反复出现,如此不可理喻。如今,尽管时常有小物欲溢出,我觉察到了,有能力加以控制。而很有趣的现象,得不到满足的小物欲,会每天主动出击,特别是在讲话时,它会无意识地从话中溜出,觉知它时,虽把它哄住、留下,却也消停不了。渐渐地也明白了对于享受都要训练的我,原来,小物欲是我刷存在感的方式!也是表达爱的一种链接。

诗人木心先生曾说:“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吹来的。”而这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距离感,又如此真切地在心头泛起细微涟漪。被清理的阳台,有了空间的简约感,很符合家的风格,那一缸鱼,还有和鱼一家亲的睡莲,在秋日私语中格外活泼可爱。秋日午后,坐在茶室里打开阳台的门,看着金灿灿的阳光,吹着初有凉意的秋风,一朵白色的睡莲在阳光里晶莹剔透地开着。忽然很喜欢那个有着小物欲的我,那么不顾一切、蛮不讲理地爱着。

在一场秋雨过后,花盆里的一株棒棒糖月季开出了三四朵粉红色的花儿,淡淡的花香随风流动,宁静之气就产生了。常言道,“境由心生”。当阳台的空间被创造了出来,视觉上有了松弛感,心的稳定性就产生了。“稳定而得满足,满足,则不焦躁。”又有诗言:“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家中无酒,阳台有新花,且以茶代酒。

忆旧
那年,她背我上学

王秀贤

闽南的雨季总是缠绵而漫长,细雨如烟,笼罩着紫帽山的轮廓。我站在紫星小学的门前,望着那排斑驳的校舍,忽然听见了时光深处传来的脚步声——笃实、沉稳,一步一步踩在湿滑的石阶上。

那是 1984 年的脚步声,是徐梨花老师背着我走过七百三十级石阶的脚步声。那年深秋,我因跌伤右腿,裹了厚厚的石膏,终日困于家中方寸之间。愁苦之际,徐老师来了。她刚从武夷山调来不久,说话带着异乡的口音,却有一种莫名的笃定:“不能误了功课,我背你去上学。”

我伏在她尚且陌生的背上,第一次清除了从家到学校的石阶——整整七百三十级。她的呼吸在第一百级时开始急促,在第三百级时加重,到第五百级,汗珠从她的鬓角滑落,滴在石阶上绽开小小的暗花。而我竟在她背上感受到了奇异的安稳,仿佛这不是一位女教师背着一个学生,而是知识本身背负着懵懂,光明背负着黑暗,未来背负着现在。

学校的条件确是艰苦的。黑板破裂如旱地的泥,粉笔屑雪花般簌簌落下,沾满徐老师的袖口。她教数学,总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解释最抽象的概念。一支粉笔,一根竹棍,便能将数字点化成精灵。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教室,照见她微驼的背脊——那是背我走过石阶的同一个背脊,此刻正背负着整个班级对知识的渴求。她批改作业至深夜,灯光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射在土墙上,宛如一座沉默的山峦。十几年如一日,她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耕耘,无怨无悔,仿佛这些石阶、这些孩子、这些数字,便是她全部的山河。

许多年后,我亦成为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才真正懂得了徐老师那背脊所承载的重量。那不只是一个小学生的体重,那是一种文明的重量。孔子周游列国,是一种背负;朱熹武夷讲学,是一种背负;而徐老师日复一日背学生过石阶,又何尝不是一种背负?教育的本质,原就是一代人背负另一代人,走向更高的地方。

去年夏天,我重回紫星小学。新校舍明亮整洁,石阶也已铺平为缓坡。我在校史馆的一角见到徐老师的照片——还是那么清瘦,眼神明亮如星。说明文字极简,但寥寥数字如何能道尽那七百三十级石阶上的汗滴?如何能说清那无数个批改作业的深夜?又如何能记载那用单薄背脊为孩子们搭起的知识桥梁?

离校时,忽见一棵老荔枝树下,有年轻教师正蹲着给一个系不好红领巾的学生耐心示范。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们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徐老师的身影在那位年轻教师身上重生,看见一种精神正以沉默的方式传递。教育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它只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背负与接力。

下山时,我特意走了那条已被荒草半掩的旧石阶路。雨水洗过的石面泛着青光,我数着自己的脚步,一、二、三……忽然在第四百级石阶上,看见一朵小小的白色野花从石缝中探出头来,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它那么小,那么不起眼,却顽强地绽放着自己的生命。我想起徐老师名字——梨花,该是这样素白而不夺目,却自有其芬芳与坚韧。

七百三十级石阶,我走了整整六年。而从学生到老师的路,徐老师用她的背脊为我丈量。如今我也到了她当年的年纪,才明白教师这个职业的真谛:我们都是背人过石阶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被记载在光荣榜上,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化作种子,埋在某个孩子的记忆里,静待花开。